《格萨尔》在青海

概　　述

《格萨尔王传》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通过对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降伏妖魔、除暴安良、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的描绘，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斗争。这部史诗在广阔的背景下，以恢弘的气势，高度的艺术技巧，反映了古代藏族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阶段及其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描述了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其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格萨尔王传》结构宏伟，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在《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萨尔王传》里，凝聚着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力，是智慧的结晶，知识的宝库。它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学的最高成就。《格萨尔王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而且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会生活、民族历史、经济文化、阶级关系、民族关系、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同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等许多优秀的史诗一样，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部史诗，不仅在藏族、蒙古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视。这部史诗的一部分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国文字广泛流传。不少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组织学者从事史诗的搜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他们把《格萨尔》视为研究南亚腹地人类文明史不可多得的历史教科书。2001 年 10 月 17 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大会上通过《格萨尔》被列入 2002—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项目，即《格萨尔》千周年纪念。这充分说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少数民族史诗创造智慧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也是国际社会对建国 50 多年来，尤其是新时期 20 多

年来对我国《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等工作的认可和充分肯定。

史诗《格萨尔》流传时间之久远，流布地区之广阔，篇幅之长，结构之巨，均称世界史诗之最。荷玛史诗《伊利亚特》共 15 693 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约 24 000 颂,(每颂 2 行,每行 16 个音),即使印度的另一部史诗《摩诃婆罗多》也只有 10 万颂,20 多万行,而《格萨尔王传》约有近两百部,以每部均为 5 000 行计，总数亦在 100 万行以上。其流布地域之辽阔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除在中国境内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纳西族、裕固族地区广泛流传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等国家也有流传。

据全国各主要流传省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截止 1987 年较为准确的统计数字，共搜集到手抄本和木刻本总数为 289 部,除去各种异文本仍有约 200 部,若按每部平均 20 万字计,它的总字数也在 4 000 万字以上。口头说唱的部数不易统计，这里依据说唱艺人们的自报，得到如下一组数字：西藏那曲的女艺人玉梅会唱 18 大宗、48 小宗；青海的才让旺堆能唱 120 部，果洛的格日尖参能写 112 部；西藏著名艺人扎巴能唱 42 部；西藏那曲地

区的次仁占堆能唱 63 部，几乎每个艺人的说唱部数都与他人不同。由此可见，《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至今仍未被发掘完的活形态的英雄史诗。

这部史诗真正被人们认识、被挖掘、整理和翻译，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多次大规模普查、搜集、抢救、整理，使这颗珍宝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和赞誉。它被载入藏族文学史册，被国际藏学界列为重要课题，成为我们国家重点抢救的科研项目。

一、历史的回顾

我省是发掘、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史诗《格萨尔》起步最早的省区之一。早在 1953 年 3 月，在全省音乐、舞蹈会演中，发现了海南州贵德县的优秀民间艺人华甲。此人能歌善舞。他说唱的《格萨尔》被王沂暖先生译成汉文，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贵德分章本”。所谓‘贵德分章本’就是整个《格萨尔》的框架结构。“贵德分章本”的出现，使我省率先掌握了史诗《格萨尔》的轮廓，也使我省成了全国最早搜集整理《格萨尔》的地区，省文联也成了全国第一所搜集《格萨尔》的单位。

1957 年，中共青海省委发出了《关于继承发扬本省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指示》，号召全省文艺工作者积极抢救流传在群众中的民间文学遗产。

1958 年 12 月 9 日,中央宣传部第 691 号函转发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拟编选《中国歌谣》、《民间故事》丛书计划。计划中明确提出《格萨尔》的定稿及写序工作由青海负责。在中央及省委的重视及关怀下,到 1959 年 5 月,我省已搜集到 8 部,加上从兄弟省转借的 6 部共 14 部、计 29 本，初步译成汉文约 40 万字。同时发现《格萨尔》不仅流传在青海、西藏、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等省区,而且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有流传。在此情况下，我省建议中央统一组织和协调此项工作。同年 12 月,中宣部、中国民研会、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及我省文联在京召开《格萨尔》史诗情况汇报座谈会，会议由已故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老舍先生主持。周扬、钟敬文、贾芝等领导出席了会议，我省文联当时的副主席程秀山（已故）以及王歌行、徐国琼、左可国等同志参加了汇报会。程秀山同志作了关于《格萨尔》史诗情况的调查报告,就史诗的历史渊源,流传范围及部目,史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国内外的研究情况等作了全面介绍，提出了进一步作好这一工作的建议和设想。会后，中宣部指示由我省牵头，全面开展对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60年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正式成立。在全国性新民歌运动的带动下，我省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了 200 多人的调查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调查搜集工作。足迹所至甘肃的夏河、四川的阿坝、甘孜、德格 西藏的拉萨、昌都、江达等地，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大量《格萨尔》手抄本、木刻本和画卷、绣像、雕塑、宝剑、铠甲、弓箭等文物。

1962年 2 月,为适应工作需要,我省成立了《格萨尔》工作组。6月，我省率先正式出版发行了藏文版《霍岭大战》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省翻译的汉译本《霍岭大战》上册。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及《民族画报》等报刊发表了评介文章，并配发了图片，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在藏文本的搜集、整理、出版中，已故著名学者才旦夏茸、藏族学者桑热嘉措、艺人华甲、吉合洛、欧旺群培和健在的省政府副主席古嘉赛等同志，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心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至 1964年,我省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达 28 部 74种之多。对这些宝贵资料，又及时地组织力量进行了翻译,共译出 28 部、50 多本,全部铅印成册,约 1 000 多万字，百万诗行，相当于唐玄奘翻译的佛经字数，

也相当于翻译 10 部《红楼梦》,为我省的《格萨尔》工作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文化艺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是紧密相关的，既然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文化艺术的发展道路也同样是曲折的、坎坷不平的。到 1964 年，在“四清”运动中，批斗了一些《格萨尔》说唱艺人,随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赶下舞台，《格萨尔王传》自然不能幸免；在十年动乱中，《格萨尔》被打成‘大毒草’‘叛国文学’‘为反革命张目”等等，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受到迫害，说唱艺人被视为“牛鬼蛇神”遭到批判。宝贵的资料被付之一炬,可以说,《格萨尔》工作以及已经到手的许多资料遭到了一场大浩劫。

二、春风吹又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格萨尔》工作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在医治创伤的同时，又开始了新跋涉，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8 年 11 月 13 日,省委批转了宣传部《关于为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平反的请示报告》,召开了平反大会，并为因参与这一工作而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12月 3 日,《青海日报》发表了题为《还〈格萨

尔〉一书的本来面目》的评论员文章，接着恢复了省文联,《格萨尔》工作又重新启动。对《格萨尔》抢救工作有特殊贡献的徐国琼、朱乃正、桑结加、扎西等同志颁发了奖状和奖金。据统计，1979 年——1980 年的两年中,不仅搜集到了‘ 文革 ’前的全部资料,而且在岭国故地 —— 果洛、玉树等地搜集到《英雄诞生》、《岭与门城》、《歇日珊瑚宗》、《岭与中华》、《向雄药宗》、《丹玛青稞宗》、《姜岭金宗》、《日努》、《祝古兵器宗》等 15 部分部本。1980 年 4 月,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四川召开《格萨尔》工作会议。接着,这一工作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云南、新疆等七省区全面铺开。1981 年又召开了北京会议，总结经验，协调规划；1983 年,国家将《格萨尔》史诗列入“ 六五 ” 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同年夏天，在西宁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年底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评奖会，我省藏文版《霍岭大战》荣获一等奖。1984 年 12 月，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艺术资料工作的通知》，批转了中国社科院《关于加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工作的报告》,批准成立‘ 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 ”。我省成立了‘ 《格萨尔》办公室 ”,后来改为‘ 青海省《格萨

尔》史诗研究所”。果洛、玉树地区成立《格萨尔》抢救办公室。夏天,国家在西藏召开了《格萨尔》艺人说唱会演。我省艺人丹巴尖措、扎格(女)、江永次城、措尼、求江等5人参加了会演，获得好评。

在中央及省委的关怀下，我省成立了以格桑多杰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整个《格萨尔》工作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1. 加强了宣传工作。省内的报刊如《青海藏文报》、《青海湖》文学月刊、《群众艺术》等连续发表藏汉两种文字的《格萨尔》章节。同时,省广播电台用藏语连续播放了《格萨尔》的部分章节。截止目前，已经播放了20几部,还在不断地录音播放,深受群众欢迎。

2. 说唱、改编、演出活动空前活跃。首先是各地群众自发地举办了《格萨尔》庙会和演唱会。果洛玛域文化中心、贵德县佐那寺还分别演出了藏戏《格萨尔》。与此同时,各专业文艺团体也根据《格萨尔》故事进行改编，上演了不少剧目；如海南州民族歌舞团演出了大型歌舞剧《格萨尔·霍岭之部》,玉树州民族歌舞团上演了歌剧《出征》，省京剧团演出的京剧《格萨尔王》、《北地降魔》等,这些演出活动不仅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推动了《格萨尔》工作的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展。

3.搜集抢救工作有了新进展。首先，对省内流传较广的 4 州 14 县 50 多个乡进行了重点普查。在玉树、果洛、黄南、海南等州的一些地区还发现了传说中的格萨尔及 30 位英雄的遗物遗迹。对玉树囊谦县达那寺和果洛州的狮龙宫殿遗迹等地发现的文物进行了初步研究，写出了一些论文。其次，发现了能唱 120 多部《格萨尔》的著名艺人才让旺堆和能写 120 多部《格萨尔》的青年艺人格日尖参。初步掌握了我省《格萨尔》民间艺人的分布情况和数量,为 55 名艺人建立了艺术档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于 1987 年 9月召开了青海省首届《格萨尔》民间艺人演唱会。会后，才让旺堆被吸收为国家干部、享受高级职称待遇，从事演唱录音工作。格日尖参也被果洛州吸收为群艺馆干部，为抢救搜集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96 年又在玉树州发现了达哇扎巴、才让索南两位年轻的《格萨尔》艺人,据他们说,两位艺人都能唱 150 部以上,并录音了 13 部之多。其中达哇扎巴通过专家鉴定，被吸收为州群艺馆干部。

十几年来,才让旺堆已录制了《托岭大战》、《阿达鹿宗》、《南铁宝藏宗》、《犀岭大战》、《吉祥五祝福》、《梅毛水晶宗》等 11 部《格萨尔》新部,录音磁带

650 多盘。其中《托岭大战》和《吉祥五祝福》已出版发行，其余的正在整理之中。格日尖参也已写出《敦氏预言授记》、《妙音琵琶宗》等 9 部，达 270 多万字。《敦氏预言授记》已出版。

到 1998年，我省搜集的《格萨尔》藏文文本累计达 40 部 81 种，还新发现了《华贡哇扎赞塔尤》、《岭将达尔藩》、《嘎德咒语》、《征服白拉国》、《征服北方妖魔国》等 7 部资料本，及 2 部异文本。

截止目前，已整理出版了 32 部藏文分部本、汉译本 1 部 5 本，出版了《格萨尔遗迹传说》、《格萨尔儿童文学丛书》（6 本）、《格萨尔学集成》（1—5 卷）、《（格萨尔）文学语言辞典》等书。整理了 6 部汉译本，已交西藏人民出版社。编写了 9 部儿童连环画脚本和第二部《格萨尔儿童文学丛书》（5 本），已交北京民族出版社，待出版。

新时期以来，藏文版《霍岭大战》获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一等奖；《白拉羊城》、《岭国形成》等 9 部获省优秀作品奖。汉文本《岭·格萨尔——霍岭战争之部》，曾多次参加国内外书展，并荣获第二届全国民间文学评奖优秀作品奖。《格萨尔儿童文学丛书》于 1999 年荣获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1987 年，在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抢救会

上，省民研会荣获先进集体称号。 1986 年,在中国社科院、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民研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落实任务大会上，我省有 3 个单位获先进集体奖、 13 位同志获先进个人奖。有 6 个单位 34 名同志受到表扬，并向为《格萨尔》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 14 位已故同志的亲属颁发了荣誉证书。 1991 年在北京召开了《格萨尔》成果展及优秀民间艺人命名大会。我省有 6 名艺人获得《格萨尔》说唱家称号。有 2 个团体和 6 名艺人受到表彰。我省有 100 多张图片、30 多件实物、50 多部资料参加展出，受到好评。 1997 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等部委召开的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我省《格萨尔》研究所等 12 个单位荣获先进集体奖。才让旺堆等 48 位个人荣获先进个人奖。

4. 为解决经费困难，我们成立了基金会，筹集了部分资金。

总之,新时期以来,我省的《格萨尔》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绩。

三、研究工作已初绽花蕾

对《格萨尔》的研究工作，是随着它的发现开始的。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格萨尔》这部史诗鲜为

人知。就连博学的黑格尔也曾认为中国没有民族史诗。当时人们只知世界上有荷马史诗《奥德修》、《伊利亚特》以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最长的是《摩诃婆罗多》,有 20 多万诗行。《格萨尔》的发现不仅否定了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论点，而且以它 200 多部的鸿篇巨制和上百万诗行、上千万字数的优势,远远超过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格萨尔》记述的人物众多,据粗略统计,史诗从天界到人间，从龙宫到地狱，出场人物达 3 000 多个。这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 3 000 多人中,除岭国的 30 位男英雄和 18 位女英雄之外，对从事各行各业的民众—— 农民、奴仆、医师、卦师、乞丐、流浪汉等都有栩栩如生的刻画。对山石草木、飞禽走兽也赋予了人的性格,或善良、或丑恶,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据考证：我国历代藏族学者在研究《格萨尔》方面，著有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述，但是笔者认为我省互助县佑宁寺的学者松巴·益喜环觉(1704—1788)和六世班禅华丹依喜(1737—1780)于 1779 年以通信方式交换过对《格萨尔》有关问题的看法和

观点，颇有参考价值。后来，松巴将他的复信汇集成册——《关于格萨尔问答》(此书藏于拉卜楞寺)。

至于史诗《格萨尔》如何传到俄国、法国及其它一些国家，以至引起世界关注，经过数十年的工作现已基本清楚。

1884 年 8 月，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曾到我省玛多县的黄河源考察，获得了一些《格萨尔》的手抄本,他于 1888 年出版了《从恰克图到黄河源》一书，对史诗《格萨尔》作了评介。另一个沙俄军官波丹宁,于 1885 年前后，曾先后 5 次来我省及西藏进行‘探险’考察,也获得了一些藏文本《格萨尔》资料，回国后发表了许多关于《格萨尔》的文章。从 19 世纪以来，《格萨尔》在世界上的流传日趋广泛。先后有英、德、法、俄、印度文的国外版《格萨尔》译本出版。

据考证，黄河源头是岭国的疆域，我省黄河流域的广大藏区就是格萨尔当年的活动场所。这一论断被发现的文物及传说所证实。如玉树州囊谦县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岭国寺，周围有百座大小不等的灵塔，有格萨尔的衣冠塔和 30 员战将的骨灰塔，塔身用金粉书写着 30 位战将的姓名和爵位。寺

内有格萨尔的王冕、金鞍、金靴、金甲、宝刀、神弓等物品，还有战将的银鞍和兵器，也有王妃及 30 员战将的家眷佩戴过的装饰品。

在我省的果洛、海南、黄南及其它一些地方也有关于格萨尔的遗址、遗物被发现。

所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学者吴均、昂欠多杰、洛者加措、毛继祖、许英国、谢佐、赵秉理、诺尔德、旦正、何峰等先后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多学科、多侧面、多层次地开展了研讨。出版了《格萨尔新探》、《格萨尔与藏族部落》、《格学散论》、《格萨尔疑难新论》等 8部专著，还有些论文和专著列入国家级和省级重点课题，并多次荣获国家级和省级奖。1989 年 11 月在成都召开的首届《格萨尔》史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省有 8 位同志的论文入选，大会宣读后受到好评。 1990 年秋，我省召开了全省首届《格萨尔》学术讨论会。新老学者及著名艺人济济一堂,就史诗的发展、民族地域、语言艺术、形象塑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1991 年 8月,在拉萨召开的第二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省有 11 篇论文入选,有 9篇论文在会上宣读。还播放了我省

录制的专题片《青海——〈格萨尔〉的故乡》,展示了我省《格萨尔》工作的概况，受到与会者的好评。第三、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也是我省的论文最多、评价最好。

四、对今后工作的几点思考

我省的《格萨尔》工作历时数十载，虽几经波折，但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在参与这一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下，毕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仅仅是开始。今后仍需努力。笔者认为：

第一、坚持搜集、整理、研究三并举的原则,继续努力做好抢救搜集工作。

前几年，我们在搜集、整理、研究三并举原则的指导下，各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展和成绩，但与整个史诗相比，我们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和我们所拥有的两个著名艺人的说唱能力相比，我们的工作也仅仅是开始。再说我们过去的搜集工作是否作到了头？还有无空白？还有无散失在民间的抄本？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第二、培养骨干、壮大队伍。

我省《格萨尔》工作者的队伍小,人力有限,而且不少同志年事已高。因此我们必须以战略家的眼光，重视队伍建设问题。我们要努力培养骨干力量，

补充新鲜血液，壮大我们的队伍，以确保这项工作的延续和健康发展。

同时，我们必须重视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提高素质,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第三，继续组织力量，做好规范文本的工作。

规范化、标准化事关《格萨尔》学体系的建设问题。史诗中一些人物、姓氏称谓、部落名称及用字。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有利于这一工作的健康发展，否则就会“乱套”。早在1984年第四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但至今没有出现像《霍岭大战》那样的五省区公认的新本子。因此，我们要及时将这一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组织力量，实现规范化目标。

第四，重视研究，加强组织领导工作，把自发的零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纳入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促进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近期，我们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遗迹遗物的研究、版本比较研究等课题上，争取有新的观点、有新的突破、有新的成果。

总之，回顾历史成绩斐然，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的困难。诸如机构不健全，经费不足，设备差，出版困难等问题都影响着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